

物的可指性*

——《公孙龙子·指物论》新解

李 巍

〔摘 要〕公孙龙所谓的“指”，通常释为共相、观念（概念）或意义，虽各有道理，却存在两个问题：一是这些解释很难表明“指”在《指物论》中的意思与在先秦的通义（用手指具体指出某物）之间有何关联；二是这些对“指”的解释也适合表达公孙龙所谓的“实”，遂令“指”“实”之别不显。结合文本，有理由认为公孙龙论“指”，是从手指的“具体指出”引申为事物的“可被具体指出”，并将“可被具体指出”看作经验对象的普遍性质，即事物的可指性。如此，就能看到“指”在指物篇的使用与其先秦日常用法的关联，也能呈现“指”“实”之别：“实”是规定事物内容的经验性质（如马之色形、石之坚白），“指”则规定了事物内容或经验性质得以被把握的条件。故《指物论》强调事物皆有可指性（“物莫非指”），这正是以“名”谓“物”的前提（“天下无指物，无可以谓物”）。但“指”不同于“名”所表达的“实”（“物之各有名，不为指”），不可在经验上亲知。故《指物论》又主张可指性本身没有可指性（“指非指”），即不能因为“指”是“物”的性质，就要求它能与事物一同在经验上被具体指出（“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”）。

〔关键词〕指 实 物 可指性 〔中图分类号〕B225.4

要说中国哲学史上最晦涩难读的文本，恐怕非《公孙龙子·指物论》莫属。正如学术前辈葛瑞汉所说：“对喜好解决难题的读者，它或许是所有中国哲学作品中最令人着迷的一部。但是，还没有两个注者已对其解释达成一致”。（Graham, 2003, p. 457）同样，以研究中国逻辑著称的赫梅莱夫斯基也坦言：“关于《指物论》，尤其是它的关键术语‘指’，迄今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诠释”。（Chmielewski, p. 187）回顾学术史，可知二人所言非虚。不过在以往的各式理解中，将“指”界定为共相、观念（概念）与意义，仍是被不少学者所接受，至今依然流行的观点。但其中有两个疑问值得关注：其一是，考虑到“指”在先秦除了表示手指，更多是表示具体指出某物的活动^①，则以《指物论》之“指”为共相、观念（概念）或意义，是否与它的日常用法相隔太远？其二是，即便

* 本文系中山大学“三大建设”专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当然，“指”在先秦也有较为抽象的意思，如《孟子·尽心下》“言近而指远”的“指”，即表意旨或宗旨；又，《荀子·正名篇》“制名以指实”“名足以指实”的“指”，则表“名”的指称或指谓，但这些都不是“指”字最主要的意思。

可以用共相、观念（概念）、意义来界定“指”，似乎同样能拿来界定《公孙龙子》书的另一基本概念——“实”，而不少论者本身就是这样看的。^①那么，“指”“实”之别何在呢？

围绕以上疑问，本文尝试说明：公孙龙论“指”乃是从动作上“具体指出”某物，引申为事物“可被具体指出”，并将“可被具体指出”看作经验对象的普遍性质，即事物的可指性。这就是《指物论》之“指”与其先秦日常用法的关联所在。而公孙龙所以将“指”从动作引申为性质，可能出于与辩者、墨家和庄子学派论辩的意图，但更是其学说从名实推进到指物的内在要求，那就是以事物具有可指性，为其能被命名的基础。因此“指”就可说是“实”之外对事物的另一种规定：“实”是规定事物内容的经验性质（如马之色形、石之坚白），“指”则规定了事物内容或经验性质得以被把握的条件。故《指物论》强调事物皆有可指性（“物莫非指”），这正是以“名”谓“物”的前提（“天下无指物，无可以谓物”）。但“指”不同于“名”所表达的“实”（“物之各有名，不为指”），不可在经验上亲知。故《指物论》又主张可指性本身没有可指性（“指非指”），即不能因为“指”是“物”的性质，就要求后者被具体指出时，前者也能一同在经验上被指出（“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”）。然而，没有作为经验性质的“指”，这并不妨碍事物具有该性质（“天下无指，物不可谓无指也”）。理解这一点，是破译《指物论》的关键。

一、从动作到性质——“指”的通义与新义

最先要说的是，认为《指物论》是在某种特殊含义上言“指”，这是合理的。正如世人说公孙龙“诡辞数万以为法”（《法言·卷二》），其“诡辞”之“诡”，就是为了论辩取胜，以某个人们不熟悉、但未必不合理的特殊用法偷换语词的日常用法。但“偷换”要成功，至少要求语词的两种用法间有可追溯的关联。是故，要判断某种关于“指”的解释是否恰当，必须检验解释者所认为的公孙龙的用法与“指”在先秦的日常用法即“具体指出”间，有无上述“可追溯的关联”。而过去以共相、观念（概念）、意义释“指”，所以并不令人满意，就在于一个表指出动作的词，要能表示抽象实体，恐非强引曲说而不可为。因之，不论怎样理解《指物论》的“指”，至少应兼顾其在先秦的日常用法。

当然，强调“兼顾”并非要弱化“指”的两种用法之别。事实上，差别不但有，而且很明显。比如《指物论》说的“且指者，天下之所兼”，“兼”是公孙龙的常用术语，表示某种性质被某些事物所共有。将“指”界定为“兼”，显然不是就日常的指出动作来说，而应与性质相关。那么最先要考虑的，就是如何将“指”的含义从“表动作”引申到“表性质”。应该说，这种引申是可能的，并且比传统解释从“表动作”到“表实体”（共相、观念、意义）的引申更自然。那就是，可以先将“指”从“具体指出”某物的动作引申为某物“被具体指出”。再进一步，则能引申为任一事物“可被具体指出”。而“可被具体指出”，正可被看作一切经验对象的普遍性质，即事物在经验上的可指性。因此，《指物论》以“指”为“天下之所兼”，就能解释为以可指性是事物兼有的性质。当然，这并不否认存在某物不能被指出的情况，但那只能归因于认识上的限制，而非事物自身不可被指出，即只要为经验个体，就始终有可指性。

^① 如冯友兰说：“公孙龙以指物对举，可知其所谓指，即名之所指之共相也”，实际是以“指”与（“名之所指”的）“实”皆为“共相”。（冯友兰，第157页）杜国庠说：“公孙龙所谓‘实’，是由他所谓‘指’而来的，而‘指’是观念的东西，因而他所谓‘实’，也不能不是观念的”，是以“指”“实”皆为“观念”。（杜国庠，第103页）而郭沫若说：“指……相当于现今所说的观念，或者共相……‘指’即是‘实’。”（郭沫若，第288页）

所以,用“可指性”解释《指物论》中被用作性质语词的“指”,应该是能被设想的。而要说依据,除了因为上举“具体指出→被具体指出→可指性”的引申是可能且自然的,更因为这种引申方式在先秦典籍中并不缺少相似案例,如:“虽小道,必有可观者焉”。(《论语·子张》)“国人皆曰可杀,然后察之,见可杀焉,然后杀之”。(《孟子·梁惠王》)“大可睹者,可得而量也,明可见者,可得而蔽也,声可闻者,可得而调也,色可察者,可得而别也。”(《文子·下德》)“可观”“可杀”“可睹”等,就是将“观”“杀”“睹”等动词在被动义上引申为对象的性质。设想公孙龙是将“指”在被动义上引申为对象的“可指”,也属相同方式。这样,就能理解《指物论》为何总是重复“物可谓指乎”、“物不可谓无指也”的问答,因为它真正要谈的并非指出活动,而是对象“可指”这种性质。那么,如果人们只知道“指”表动作的日常用法,不知其表性质的特殊用法,就势必陷入“诡辞”的陷阱。如《指物论》首句“物莫非指,而指非指”,单从日常用法看,就既是主张事物被具体指出,又主张指出的活动不能有所指出,显然是一个矛盾陈述。大概公孙龙的用意,就是要让人们困惑。

而他最得意的,应该正是在“指”表动作的通义之外揭示其表性质的新义,并由此对“物莫非指,而指非指”作出新的理解,即事物莫不可被具体指出,但“可被具体指出”这性质本身不可被具体指出。说得更简单些,就是事物莫不具有可指性,但可指性本身不具有可指性。这样,一个原本矛盾的陈述就说得通了。此中原理,就是将及物动词在被动义上引申为表性质,这仅是所及对象的性质,而非它自身的性质。当然,这样说的前提是已经将“指”从主体“具体指出”的动作引申为对象物有“可被具体指出”这种性质(可指性)。而这,应该就是“指”在先秦的日常用法与在《指物论》中的特殊用法间“可追溯的关联”。而循此关联,不仅能说明《指物论》对“指”的引申(即从表动作到表性质),也能推测公孙龙作此引申的缘由,即:“指”虽为先秦学术的小众话题,在名辩思潮中却颇受重视,故公孙龙将“指”从主体动作引申为对象性质,就应与学派论辩有关。

首先是辩者与墨家。按文献,辩者主张“指不至,至不绝”(《庄子·天下篇》)、“有指不至,有物不尽”(《列子·仲尼》),是对事物能否被指出,抱有极大怀疑。但《列子》将此怀疑主义当作“龙旒魏王”的话,却并非公允。因为《指物论》强调“指”是性质(可指性),就意味着辩者说的“不至”“不绝”“不尽”都只是认识上的限制使然,而非对象本身不可指出,故所谓“物莫非指”“非有非指”,正可看作对辩者的怀疑主义的制约。至于墨家,其立场则温和得多,即并不否认指出某物的可能,而只是要将指物活动可以实施与不可实施的情形区分开。前者叫“有指于二而不可逃”(《墨子·经下》),是说对象在场,如“坚白二也而在石”(《墨子·经说下》),就总能具体指出(“有指于二”)、没有遗漏(“不可逃”)。反之,对象缺席则“所知而弗能指”(《墨子·经下》)。如某人被抓走时“弗能指”,臣仆逃匿无踪时“弗能指”,不名为“犬”的狗“弗能指”,不可再造的失物“弗能指”(《墨子·经说下》),这都是讲对象不在场才“弗能指”,自然比辩者“指不至”的极端主张合理。但墨家仍然只关注作为动作的“指”。故从《指物论》以“指”为性质的观点看,其“弗能指”之说仍有问题。因为非“犬”之狗和不复得的失物“弗能指”,与其说是不在场使然,不如说是因为对象已然非“物”;但被抓走或逃匿之人“弗能指”,则只是认识的局限使然,而非对象本身“弗能指”。故《指物论》屡言“物不可谓无指也”,大概也有针对墨家的意图,即他们并不了解“指”在表动作的通义之外,还有其表性质的新义。

再看道家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有“以指喻指之非指,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”的著名说法。虽不知此言与《指物论》的确切对应,但至少能确定二者关联甚大,即《指物论》主张事物有“指”(物皆有可指性)而“指”自身“非指”(可指性本身没有可指性),这思路很像是《齐物论》说的“以指喻指之非指”。可是,道家真正倡议的是“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”,故与《指物论》以“指”

为中心的立场不同,强调以“非指”为中心。这大概正因为“道”的特征就是“非指”,如所谓“道昭而不道”,“夫道,……可传而不可受,可得而不可见”。(《庄子·大宗师》)那么,“以非指喻”就能说是“以道观之”(《庄子·秋水》)的另一表达,而“以指喻”则可类比于“以物观之”(同上)。是故,说“以指喻……不若以非指喻”,其实就是强调“以道观之”高于“以物观之”。如果这正是庄子本人的主张,则《指物论》对“指”的讨论就能看作一种回应,即不论怎样强调“以非指喻”或“以道观之”,正名者还是要“以指喻”或“以物观之”,否则就谈不上“凡物载名而来”(《管子·心术下》)的“名”。反过来,如果“不若”云云出于读过《指物论》的庄子后学,则此说也能看作对公孙龙的批评。但即便这样,也并未否定《指物论》以“指”为事物性质(可指性)的观点,只是认为还不够,即有见“物”之有“指”、未见“道”之“非指”。应该说,以上两种情况都有可能。但不论哪一种,《齐物论》以“道”(“非指”)为本与《指物论》以“物”(“指”)为本的立场分别是很显著的。

说到这里,前述第一个疑问就迎刃而解了。因为有理由相信,将“指”解释为可指性,会比传统的共相说、观念(概念)说、意义说更利于把握将“指”从日常动作义引申到《指物论》特有之性质义的线索,也更利于在诸子论“指”的大背景中审视公孙龙作此引申的原因。

二、从名实到指物——“指”“实”之别

再看第二个疑问。以下将说明,以“指”为可指性,要比传统解释更适合呈现公孙龙学说中的“指”“实”之别。如《指物论》所谓“天下无指者,生于物之各有名,不为指也”,有论者认为,这句话“证明‘指’与‘名’有相同的性质,即‘指’可以代替‘名’,起‘名’的作用,也就是说,‘名’是‘指’的一种”。(李耽,第49页)但笔者认为,此语恰是在强调“名”与“指”不同,即人们认为“天下无指”,是因为(“生于”)通过事物的“名”(“物之各有名”),无法把握事物的“指”(“不为指”)。为什么呢?因为“夫名,实谓也”(《名实论》),“名”只表示“实”,如“马者,所以命形也;白者,所以命色也”(《白马论》)的颜色、形状,即事物呈现的经验性质。那么,不能通过“名”来把握“指”(“不为指”),就正在于“指”不是“实”,不是经验性质。故《指物论》反复强调“指非指”,即以可指性(这性质本身)不具有可指性,说明不能像具体指出事物的“实”那样指出其“指”。而该篇所以难读,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既主张“指”是凡物兼有的性质,又要说该性质不能在经验上具体指出。那么,关注“指”“实”之别,就要进一步思考公孙龙为何在可经验的“实”之外另立一非经验的“指”,即为何在名实外别论指物。

这当然有思想环境的原因,即前述先秦名辩思潮中指物问题本就渊源有自,而公孙龙论“指”,尤其是将“指”当作“物”的性质,应有与诸子对应的意图。但更重要的,则是通过以“指物”为“名实”奠基,来解决自身名实理论的困难。该理论在《名实论》中有纲领性表述。首先是将“实”界定为充实于“物”,令事物具有内容的东西(“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,实也”)。此前,说它们是经验性质,只是以公孙龙所论马之色形或石之坚白为例。《名实论》则有更充分的依据,即强调“实”在“物”中有各自的“位”或位置(“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,位也”),那当然就是有确定呈现、可由感官辨识的诸经验性质。因此,进一步讲名实相应,就是使“名”与色、形等在“物”中“位其所位”(即有确定呈现)的“实”对应。这包括两个规定:一是“非则不谓”,即不能以“名称谓与其‘实’占‘位’不同的‘实’”。如《白马论》强调“命色者非命形也”,即色形二“实”在马中占“位”不同,所以色名就不能称谓形名称谓的东西;另一是“不在则不谓”,即某“名”所对应的“实”,如果并非在事物中“位其所位”,而是“出其所位”(即没有确定呈现),也不能以

该“名”称谓。如“白”所命之“实”不在马中占“位”，即“使马无色”或马色非白时，就不能以“白”谓马，故说“白者不定所白，忘之可也”（《白马论》）。按这两项规定，可知名实相应乃是一一严格对应，即“彼（名）”唯独称谓“物”中占“位”呈现的“彼（实）”，“此（名）”唯独称谓“物”中占“位”呈现的“此（实）”，是谓“其名正，则唯乎其彼此焉”。

《名实论》的这个正名原则，虽于《白马论》中有显著运用，但在《坚白论》中却难以贯彻，因为该篇对“离”的讨论，恰表明某“实”（如坚或白）在某“物”（如石）占“位”，这并非必然，而是也存在离而自藏、不驻于物的可能，这就会出现有名无实的状况，更何谈名实相应。现在，就来具体看看《坚白论》的论述。该篇为主客对辩体，主方申论离坚白，即以坚白石之坚硬、白色能够与石相“离”而退藏于密。客方则反对说：“其白也，其坚也，而石必得以相盈。……坚白域于石，恶乎离？”这既是在事实层面，以坚白石实际有坚有白（“坚白域于石”），反对离坚白；更是在模态层面，以坚白石必然有坚有白（“其白也，其坚也，而石必得以相盈”），反对离坚白。而论主所谓“离”，其实只针对后者，即主张坚白能与石相“离”，这并非否认坚白石在事实上有坚有白，而是否认将此事看作必然。因此，论主对客方提出两点反驳：第一，是坚硬、白色是所有坚物、白物共有的性质（“兼”），并不限定在某些事物上（“不定其所白”“不定其所坚”），既如此，所举坚白事物中不必然包括石头（“恶乎其石”）；第二，坚、白不但可能脱离石头，更可能脱离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（“未与物为坚”“不白物而白焉”），但这样的坚、白并不在经验界显现（“天下未有”），只能“自藏”在抽象领域：那里还有其他独立存在的性质（“黄黑与之然”），却没有作为具体个体的石头（“石其无有”），又枉论坚白石（“恶取坚白石乎”）。

总的说来，以上反驳可以成立。因为从模态的角度看，“坚白石有坚有白”为真，但“坚白石必然有坚有白”则非真，因为总能设想某种反事实状态，是叫作“坚白石”的东西并不坚硬或并非白色。故上举主方的反驳，正可看作对相关反事实状态的设想。其目的，正是表明在“必”的模态层面，可以说“坚必坚”“白者必白”（《坚白论》），却不能说坚白“石必得以相盈”。换言之，对“离”的强调，是通过指出坚白二“实”不仅是物的性质，也是能离物的独体，表明坚白石有非坚或非白的可能。可问题是，承认这种可能，就会给践行《名实论》“唯乎其彼此焉”的正名原则造成困难。因为只要某“实”不必然在“物”（如坚白并非必然在石），也能与“物”相“离”或“出其所位”，就谈不上名实相应。那么反过来说，要保证名实相应是一项有意义的要求，当然必须说明“实”能在“物”中“位其所位”，有所呈现的原因。并且，这原因显然在“物”而不在“实”，因为坚、白既能“离”石“自藏”，成为抽象领域的独体，则其著显于石，成为“石之白”“石之坚”，就绝非自身使然。所以，必定是“物”具有某种特性，才能令“实”的呈现成为可能。而这特性，就是《指物论》之“指”。正如说“天下无指物，无可以谓物”，即强调只有断定“物”是具有可指性的物（“指物”），才能以“名”去称谓它（“谓物”），也就是去称谓其中占“位”呈现的“实”。可见在公孙龙那里，对“指物”的讨论正是要为“名实”奠基。故《指物论》无一处言“实”，这正因为“实”的问题（即某“实”因何成为“在物之实”而能被“名”称谓的问题）必须以“指”说明。不把“指”讲清楚，就无以论“实”，更无以“正名实”。

所以，公孙龙在“名实”之外别论“指物”，是其学说逻辑的必然走向。由此，也就能对前举第二个疑问作出回答。那就是，以“指”为可指性，最能表明“指”“实”有别。区分的关键，则正在于“物”之有“指”不同于有“实”，不是具有某种经验性质，故不能在经验上具体指出（“指非指”）。但一般而言，人们说事物有某性质，总是已在经验上指出了它，现在认为“指”是“物”的性质，却又不能具体指出，这的确令人疑惑。故《指物论》说“非指者，天下无指，而物可谓指

乎?”就是在模拟上述质疑,即事物的可指性不能在经验上具体指出(“非指者”),经验界就没有这种性质(“天下无指”),如何能说事物是有可指性的呢(“物可谓指乎”)?类似的质疑,《指物论》也表述为“指也者,天下之所无;物也者,天下之所有,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,未可”,即以“物”为经验实在,“指”非经验项目(即不作为经验性质存在),则认为“物”有“指”,就是让存在者具备不存在的东西,故说“物不可谓指也”。然而,公孙龙断定事物有“指”,本就不是在具有某种经验性质的意义上来说的,正如“天下无指者,物不可谓无指也。不可谓无指者,非有非指也。非有非指者,物莫非指也”,就是强调,没有作为经验性质的“指”(“天下无指”),这并不足以否定事物有“指”,因为断定可指性是物的性质,其依据是没有不能被指出的物(“非有非指者”),凡物皆可被具体指出(“物莫非指”)。

如此看来,“指”作为“物”的性质,与“实”或经验性质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它并不对实际的认识活动负责,而是用于说明事物为何能被认识(即“有指”或具有可指性)。故“物莫非指”绝不意味事物皆已在认识上被具体指出,而是强调没有本性上不可被指出的物,即凡物皆因其本性而有可指性。那么,虽然《名实论》的“实”是对“物”之内容的规定,但“指”却是另一种规定,不是规定事物有哪些经验特征,而是在本体论上规定其特征呈现于物的条件。因此,对事物有可指性的肯定,不可能像对“实”的把握那样诉诸经验,更没理由认为事物被具体指出时,其可指性这种性质也能一道被指出,故《指物论》篇尾明言“指固自为非指,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”。这就像弗雷格指出的,不能把“由一个概念断定的性质理解为构成概念的标志。这标志是处于概念之下的事物的性质,而不是概念的性质”。(弗雷格,第70-71页)因此,可指性只是处于指概念之下的“事物的性质”,而非指概念自身的性质。所以,《指物论》断定“物莫非指”时,也必定要主张“指非指”,即可指性自身不具有可指性。

以上提出了一个关于《指物论》的新解读,但绝不是要否定传统的共相说、观念说和意义说。就目前来看,既然已将公孙龙所谓“指”与其先秦的日常用法沟通起来,并能与他的另一核心术语“实”区别开,就有理由相信用“可指性”释“指”,是破译《指物论》谜题的可行方案之一。

参考文献

- 古籍:《法言》《公孙龙子》《淮南子》《礼记》《列子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墨子》《荀子》《庄子》等。
- 杜国庠,1962年:《杜国庠文集》,人民出版社。
- 冯耀明,2000年:《公孙龙子》,东大图书公司。
- 冯友兰,2000年:《中国哲学史》(上)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弗雷格,2005年:《算术基础》,王路译,商务印书馆。
- 郭沫若,1996年:《十批判书》,东方出版社。
- 胡适,1999年:《先秦名学史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。
- 李耿,1998年:《先秦形名之家考察》,湖南大学出版社。
- 俞樾,1956年:《诸子平议补录》,李天根辑,中华书局。
- Chmielewski, J., 2009, *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*, ed. by M. Mejer, Komitet Nauk Orientalistycznych Press.
- Graham, A. C., 1990, *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s*,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.
- 2003, *Latter Mohist Logic, Ethics and Science*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.

(作者单位:中山大学哲学系)

责任编辑:冯国超